

论东汉宦官在教育科学文化领域的贡献

范宇飞¹

(¹渤海大学, 辽宁 锦州 121013)

摘要: 东汉宦官集团在东汉政治斗争往往对被认为是同士大夫作对的一股邪恶政治力量, 而忽视了他们在当时教育、科学、文化领域的贡献。教育领域“鸿都门学”的建立冲击了以儒家经学为唯一教育内容的旧观念, 倡导研究文学艺术; 科学领域个别宦官借助职务和皇室的支持, 进行科学、工艺的发明创造; 文化领域上个别有素养的宦官主持了儒家经典文书校勘工作等。宦官能在诸多领域取得成就依靠的是皇室的支持、自身文化素养以及政治斗争。但是宦官中的大多数宦官出自社会下层, 在文化上更容易接受世俗的事物并排斥儒家正统思想, 造成了汉末宫廷文化的市井化。

关键词: 东汉宦官; 汉代科技; 鸿都门学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Eastern Han Eunuchs to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Fan Yufei¹

(¹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Liaoning Province, 121013)

Abstract: During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eunuch group was often regarded as an evil political force opposing the scholar-officials, while their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neglecte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du Gate Academy challenged the traditional notion that Confucian classics were the sole focus of education, advocating instead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small number of eunuchs, leveraging their official positions and imperial support, engaged in inventions and innovations. Culturally, some eunuchs with scholarly attainments presided over the textual coll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al documents. These achievements were made possible by imperial patronage, their own cultural literacy, and their 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maneuvering. However, most eunuchs originated from lower social strata and were more inclined to embrace secular influences while rejecting orthodox Confucian ideals, contributing to the vulgarization of late Eastern Han court culture.

Keywords : Eastern Han eunuchs; Han dynas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du Gate Academy

引言

东汉宦官集团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无论政治地位还是影响上都是特殊的存在。目前学界对于东汉时期宦官的研究更多停留在宦官在政治上的作用, 尤其是宦官专权和宦官与士大夫、外戚的斗争, 而且对于东汉宦官的评价以负面居多。对此葛承雍的《不应一概贬低东汉宦官》一文中指出对于宦官“贬斥太过”^[1];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提及“宦官亦有贤者”^[2]。为此, 华青在其《论秦汉宦官在科技文化领域的贡献》中提及了宦官在科技文化领域的贡献, 但尚有可继续发掘的空间, 故对此问题进行考述:

1、东汉宦者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的表现

作者简介: 范宇飞 (1998—), 男, 四川南充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研究。

1.1 东汉宦官在教育领域的推动作用

东汉灵帝时期所设立的鸿都门学，对“独尊儒术”的汉代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也为后来因科举而设的各类专科学校开辟了道路。在桓帝、灵帝时期，东汉思想文化较之于前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汉灵帝本人也爱好文学、书法，亲自编撰《皇羲篇》。汉灵帝召集了一批擅长写诗作文的儒生，他们靠奇技淫巧讨好皇帝^[3]，这引得正统官员的不满与反对，反而使灵帝下定决心正式办学。

鸿都门学的设置虽然表面上是皇帝出于自身爱好所设并公然跃出传统儒学取士而采取文学艺术取士，并遭到了士大夫官员的不满与反对，但是将其放于当时的政治背景当中去不免也能发现宦官的身影。范文澜先生认为“宦官在太学以外要另立一个太学，一七八年，汉灵帝立鸿都门学。”^[4]东汉中后期政治斗争围绕着儒学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所展开，此时的宦官集团往往利用皇权作为工具与士大夫集团进行斗阵，而士大夫集团则以太学作为反抗宦官集团的阵地。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直接引发了东汉后期巨大的政治动荡——党锢之祸。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被残酷镇压。此后，灵帝“西邸卖官”，宦官集团亲党得以轻松入仕，此举遭到了清议士大夫的猛烈抨击。在此情形下，宦官集团需要建立一个区别于传统儒学士大夫入仕为官的通道以填补“党禁”所造成的政治真空状态，至此鸿都门学孕育而生。

汉灵帝于东汉光和元年（178年）创立“鸿都门学”，因其设立地址位于鸿都门而得名，李贤为《后汉书·灵帝纪》作注：“鸿都，门名也，于制内学，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5]处于政治、文化边缘的才艺之士，他们进入鸿都门学，以才艺作为选拔标准，成为宦官集团的政治附庸，以达到取替太学的目的。^[6]鸿都门用辞赋、书法等文学艺术形式与经学进行对抗，成为了与太学斗阵的文化教育阵地。由于灵帝的支持，鸿都士人人数一度超越千人规模，使得汉末宫廷中文学艺术之风盛行。陈寅恪先生认为东汉后期宫廷中所盛行的文学艺术之风是建安文学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7]。

虽然鸿都门学的设立与宦官集团势力膨胀密切相关，鸿都士人对宦官集团极度依赖，遭到儒学士大夫的反对。但是鸿都门学在教育、文化上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鸿都门学的设立冲击以儒家经学为唯一教育内容的旧观念，倡导研究文学艺术，突出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的教育方式，是对教育的一大贡献。同时，鸿都门学所招收学生大多起自社会下层，突破贵族、地主阶级对学校的垄断，使下层文人也能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

宦官还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在“家学”盛行的东汉，家学作为私学的一种特殊形式，成为经学、自然科学传播的主要途径^[8]。在东汉后期，宦官养子盛行，例如十常侍之一张让收养太学生、大长秋曹腾收养曹嵩等。“养子”制度的形成既包含了政治联盟的需要，也暗含了文化传递的功能，打破了东汉“学在士族”的垄断，形成了一条特殊的“非血缘的知识传播”途径。

1.2 东汉宦官在科学领域的推动作用

东汉时期，宦官作为皇室近侍依靠着其特殊身份可以得到皇室的支持，将皇家资源加以有效利用，以助其在科技领域实现创新发明。《后汉书·宦者列传》载“永元九年，（伦）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9]尚方是制办和掌管宫廷饮食器物的宫署，蔡伦担任尚方令时，所监造刀剑器械质量非常高，被后世效法学习，这表明蔡伦在工艺研制方面有着突出贡献和重要的影响力。

有关造纸术，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10]又根据原材料不同有不同名称，以麻作为原材料称为“麻纸”，用木皮称为“楮纸”，用旧鱼网称为“网纸”。^[11]蔡伦的造纸术不仅成就了他个人使之被封为侯，其所献纸得到汉和帝欣赏并为全国推广使用。自此，轻薄便宜易携带的纸张得以推广应用，逐渐取代了沉重且昂贵的简帛。

除了蔡伦之外，宦者在工艺技术方面也有着突出成就。汉灵帝时期的宦者毕岚因其为讨好皇帝所作翻车，却在造福了后世百姓。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载毕岚担任掖庭令，负责汉宫的建

筑修缮、园艺等工作，他所作“铜人”、“四钟”等装饰，体型硕大。“天禄蝦蟆”、“翻车渴乌”等器械^[12]。虽然这些发明服务于皇家，但客观上也促进了东汉科技进步，同时这是翻车见于史籍之始，所以毕岚被认为是翻车的创始者^[13]。此外毕岚还组织都城排水系统的工匠培训，一定程度上促使排水技术得以传播。

1.3 东汉宦官在文化领域的推动作用

东汉儒学大兴，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浓厚，故而东汉在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谢名会先生在对东汉宦官籍贯分布特点和现象的影响因素分析时提到：“东汉的宦官需要辅佐皇帝，且需要跟外戚集团进行权力上的斗争，因此东汉的宦官多是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14]同样，在《后汉书·宦者列传》中所提大部分的宦官也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权谋。这些宦官在学术上的作为在推动东汉文化领域的繁荣中做出过一定贡献。

蔡伦、李巡、赵祐等宦官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是宦官在文化领域的具有推动作用的代表。蔡伦于永初四年主持了儒家经籍等文献的校订，改变了当时儒家典籍“文多不正定”^[15]等现象，范晔评价蔡伦“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16]，清人赵翼称之为“汉宦官之贤者”^[17]。灵帝时期，李巡主持熹平石经的校勘与刊刻。清人何焯在其《义门读书记》卷二四《后汉书·宦者列传》提到：“熹平石经之立，发于李巡，可以喟息。《经典序录》：‘《尔雅》李巡注三卷。’”^[18]李巡能著《尔雅》三卷，说明其在学术上确实有着较高水平。与李巡同时期的赵祐也“博学多览”^[19]，参与到了儒家经典书本的校勘中，得到了儒家士大夫的赞许。此外，灵帝时宦官上书陈时弊，能多引用《周易》等儒家经典，具有很高学术水平。拥有较高学术素养的宦官适时地向皇帝提出校订儒家经典、引用儒家经典进谏等行为对于东汉文化领域繁荣起到推动作用。

2、东汉宦官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发展原因探析

2.1 皇室的支持

东汉皇室对于宦者的支持在其推动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东汉对于文化的重视始于光武帝。刘秀兴建太学，立五经博士，鼓励私学。也是光武帝在位时期，光武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故“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使得宦者得以在东汉后期发展成为“手握王爵，口含天宪，”^[20]的群体。两者在时间线上重合，宦者逐渐受到东汉皇室的重视，为后来宦官在教育、科技、文化领域创造条件。

在刘秀决定“偃武修文”后，许多人开始重拾就业，“敦习儒学，”豪强开始士族化^[21]，家学教育开始兴盛。这些士族的子弟与皇族的联姻，使得东汉政府更为重视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其中和熹皇后邓绥对于邓论的支持最为突出，刘光欲认为：“宦官蔡伦搞发明创造不能没有支持，东汉宫廷里有蔡伦的得力支持者，就是和帝，特别是邓皇后”^[22]。据《后汉纪·和帝纪》载：永元十四年（102年）邓皇后下令禁止上贡珠玉宝物，每年能够上贡只能上贡纸（绢素古纸）墨。^[23]邓绥支持蔡伦改进造纸术并提供资质，时常过问蔡伦相关工作进展。元兴元年（105年），“蔡侯纸”问世标志着蔡伦对于造纸术的改造得以成功。邓绥作为皇后以身作则，在汉廷中使用、推广“蔡侯纸”，邓皇后的行为使得纸在东汉上层社会受到关注并推广开来。蔡伦能够改进造纸术除了自身的技巧外，与汉和帝、邓皇后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蔡伦、李巡在安帝、灵帝时期得到重用，使他们参与到儒家经典文本的校订工作中，也发挥了宦者在监视文化事业、促进文化发展的作用。元初元年（公元117年）汉安帝发现汉廷中所收录的经典文献存在多处错误，于是让以刘珍为代表的贤良文学会于东观对文献进行校订，并下令让蔡伦进行监管。蔡伦与贤良文学进行的文献校订为了经书确立一个明确的标准文本做出了贡献。也是东汉官方经典文献记于纸张开端。^[24]而李巡也是发现了诸博士在监考甲乙科时，出现了舞弊、漏题行为，甚至有贿赂掌管典籍的官员在书籍文献上作改动，将自己的文章写于文献之上以作圣贤之语，所以李巡向汉灵帝提议，将儒家经典刻于石碑之上，汉灵帝赞同了他的做法并付诸实施。^[25]汉安帝、汉灵帝对于儒家经典的校勘的支持，足以看出东汉皇室对于文化事业的重视，同时派遣宦者进行监工参与到校订工作中，既能出于对士大夫的监视，也能看出他们对宦者的信任。灵

帝对于宦者的支持还体现在鸿都门学的建立上。虽然鸿都门学的设立与宦官集团势力膨胀密切相关,但是灵帝出于对文学、书法的爱好以及对抗豪门士族集团控制下的太学从而支持宦官集团也不无关系。

2.2 自身的文化程度

东汉宦者自身的文化水平是其推动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基础。对于东汉宦官集团的文化特征及其文化取向,陈寅恪先生指出宦者“出生于非儒家的寒族”,宦者“善文辞”、“重智术”与“宗经义”、“贵仁孝”的儒家士大夫大为不同^[26]。所以在灵帝时期,李巡看不惯儒家士大夫为了一较高下而不择手段,于是自荐去改变现状,起码在这一点上他的精神比当时绝大多数的士人正直,是有学识、修养的宦者。

从《后汉书》上看,宦官一大部分是具有一定知识和权谋,例如曹腾“好进达贤能”、侯览“颇识典物”等。部分宦官身居高位后深受儒学思想,要求后人学习儒学经典,这就导致了宦官集团家族后代逐渐出现像士大夫转变的现象。

2.3 政治斗争的影响

政治斗争是东汉宦者促进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宦官参与到政治斗争众是东汉政局的一大特点。东汉初期政治较为清明,皇帝个人品质较高,所以宦官擅权的局面没有出现,但是光武帝“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27]使得宦者队伍不断壮大,为宦官势力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自和帝以后,宦官集团不断参与到与外戚集团、士大夫集团的斗争当中,直到桓、灵二帝时期宦者势力达到顶峰。在宦官集团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皇帝和以后妃为核心的外戚集团都起到推动作用,宦官集团因其近侍内廷的原因受到重用,宦者因此得以手握权力推动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

宦官在政治斗争中间接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汉灵帝时期最为突出。汉灵帝不顾朝臣反对,同意宦官集团的请求,设立鸿都门学,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述:“五经文字与宦官本来毫不相干”^[28]其目的就是为了对抗豪门士族集团控制下的太学,试图另起炉灶,打造另一派政治势力。

3、宦官推动的教育科学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

东汉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科技成果,宦者或多或少的参与到其中。东汉经学的繁荣是一代代经学大家的成果集合而成,在这之中也能发现如蔡伦、李巡等宦者的助力,他们对儒家经典文书的校订和整合使之得以规范,这影响着士人仕途乃至国家文化事业发展,在文献校勘史与传播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鸿都门学的设立开辟了除儒经取士的其他形式的取士方式,突破了“独尊儒术”政策的藩篱,为艺术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为后来特别是唐代的科举和设立各种专科学校提供了借鉴。而以蔡伦“造纸术”为主的宦者主持的科技发明,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然而,宦官对于文化事业推动,也使得宫廷内生活逐渐衰败。正如陈寅恪所述,宦者大多出生于“非儒家之寒族”^[29],其中大多数宦者是没有接收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反而因其自幼生于市井,在文化上更容易接受世俗的事物。随着宦官集团势力的不断发展、东汉汉后期幼主即位的背景下,为了取得操纵皇权的特权,他们通过不断引进各种异端思想和游乐活动,使得小皇帝乐此不疲沉溺于奇技淫巧当中,自觉地排斥儒家士大夫所传授的枯燥无味的儒家传统观念。例如,《后汉书·蔡邕传》(下)载:宦者鼓动桓帝玩乐,桓帝也沉迷其中,^[30]导致宫廷文化逐渐堕落。到了汉灵帝时期宫廷文化进一步市井化向着鄙俗化发展。《后汉书·灵帝纪》载:“(光和四年)是岁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估服,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轡,驱驰周旋,京师转相仿效。”^[31]“(熹平四年)改平准为中准,使宦者为令,列于内署。自是诸署悉以阉人为丞、令。”^[32]以上记载了汉灵帝时期宫廷生活的糜烂,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使得儒学士大夫集团遭受到了严重打击,“省内狗冠带绶”等行为则是轻辱士大夫之意,而宦者又负责宫廷生活琐事,使得灵帝更加沉迷于游乐。到此,汉代后期宫廷文化与民间市井文化相差无几。

综上所述,东汉时期的宦官集团对教育、科学、文化领域皆产生了影响。教育领域“鸿都门学”的建立冲击了将儒家经学奉为唯一教义的旧观念,文学艺术教育得以提倡;科学领域个别宦官借助职务和皇室的支持,进行科学、工艺的发明创造;文化领域上个别有素养的宦官主持了儒家经典文书校勘工作等。但是宦官也使得宫廷内生活逐渐腐败,宫廷文化逐渐市井化。

参考文献:

- [1] 葛承雍. 不应一概贬斥东汉宦官[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2, (03): 79-85.
- [2] 赵翼: 《廿二史劄记校证》卷四《后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年, 第 325 页
- [3] 《后汉书》卷六〇《蔡邕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1740 页
- [4] 范文澜: 《中国通史》第二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第 191 页
- [5]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325 页
- [6] 王永平. 汉灵帝之置“鸿都门学”及其原因考论[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 (05): 11-17
- [7]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年, 第 48 页
- [8] 马小方. 两汉家学研究[D]. 山东大学, 2006 年.
- [9]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2523 页
- [10]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2534 页
- [11] (汉) 刘珍: 《东观汉记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年, 第 365 页
- [12]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2498 页
- [13] 封五昌. 毕岚始作翻车[J]. 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 (04): 62.
- [14] 谢名会. 浅析东汉宦官籍贯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原因[J]. 西部学刊, 2021, (24): 122-125.
- [15]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2543 页
- [16]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2533 页
- [17] 赵翼: 《廿二史劄记校证》卷四《后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年, 第 325 页
- [18] (清) 何焯: 《义门读书记》卷二四《后汉书·宦者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年, 第 369 页
- [19]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2534 页
- [20]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12 页
- [21] 孙腾达. 东汉初年军功阶层研究[D]. 渤海大学, 2014.
- [22] 刘光裕. 发明家蔡伦生平事迹考[J]. 齐鲁学刊, 2000, (04): 104-107.
- [23]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166 页
- [24]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256 页
- [25]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325 页
- [26]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年, 第 48 页
- [27]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32 页
- [28] 范文澜: 《中国通史》第二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第 326-326 页
- [29]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年, 第 48 页
- [30] 《后汉书》卷六〇《蔡邕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1743 页
- [31]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328 页
- [32]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330 页